道光皇帝与鸦片战争

李　书　源

1840年，西方资本主义强国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用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作为清政府的最高决策人和反英侵略斗争的最高组织者和指挥者，道光皇帝对于鸦片战争的重要影响自不待言。剖析道光皇帝在鸦片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态度与举措，不仅有助于正确地评价这位身历两个历史时代的封建君主，而且对理解整个晚清对外政策的演变也会有某些启示。

一

清王朝自嘉庆后已走上了穷途末路，而此时的西方世界正处于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潮流巨变之中。“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①为了打开中国这个广袤市场的大门，从十八世纪七十年代起，英国资产阶级开始将大量鸦片走私到中国。罪恶的鸦片贸易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机，而英国资产阶级却大发横财，“捞到十分可观的收入。”②输毒与禁烟成为中英之间的主要矛盾。

道光继位后，即遇到棘手的禁烟问题。在英国殖民主义者的鸦片侵略面前，他坚持了严禁的立场。即位伊始，道光即重申了禁烟法令：“凡洋船至粤，先令行商出具所进黄埔货船并无鸦片甘结，方准开舱验货。其行商容隐，事后查出加等治罪。开馆者议绞，贩卖者充军，吸食者仗徒。”次年，诏令海口严拿烟贩。三年，又订立各级官吏失察鸦片条例，规定：“嗣后如有洋船夹带鸦片烟进口，并奸民私种罂粟煎熬烟膏，开设烟馆，文职地方官及巡查委员，如能自行拿获究办，免其议处，其有得规故纵者，仍照旧例革职。若止系失于觉察，按鸦片多寡，一百斤以上者，该管大员罚俸一年，一千斤以上者，降一级留任，五千斤以上者，降一级调用。武职失察处分，亦照文职画一办理。”③1830年，又令官员议奏禁种罂粟、私熬土烟的方法，并严饬广东地方官将鸦片来源断绝，以尽根株。但是，由于政治的腐败，这些诏书收效不大，鸦片烟毒的泛滥并未得到禁遏。部分官员对禁烟失去信心。1836年6月，太常寺卿许乃济上奏要求驰鸦片进口之禁，允许以药材名目纳税进口。道光不为驰禁说所动，“拒绝征收一项必定会随着人民堕落的程度而增大的税收。”④他支持朱醇、许球、袁玉麟等禁烟派“谨守旧章”、坚持禁烟的意见，谕令两广总督邓廷桢将粤口漏银入烟的种种弊端“悉心妥议”、实力堵塞，此后又一再申令，“采取了非常措施。”⑤在道光的严厉申饬与督促下，广东的禁烟活动有所开展。1837年初，贩运鸦片的快蟹、扒龙大部分被摧毁。8月，邓廷桢遵旨传谕英国驻广州商务监督义律，将泊在伶仃洋等处的趸船概行遣令回国。11月，又下令驱逐九名英国鸦片商人。这些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英国鸦片贩子查顿在给他的同伙的信中“不得不作这样的报告：由于当局的防范森严，洋药市场每况愈下。”⑥

1838年6月，鸿炉寺卿黄爵滋上《严塞漏厄以培国本折》，提出“重治吸食”法，道光谕令

发交盛京、吉林、黑龙江将军和各省督抚议论回奏。至12月，共有二十九人奏复，其中二十一人反对，八人赞成。尽管赞成者人单势孤，道光仍旗帜鲜明地支持了他们的主张。黄爵滋提出重治吸食后，道光立即要求各大员"妥议章程，迅速具奏。"使严禁主张产生了巨大影响。"奸徒闻有论死之法，莫不魄悸魂惊。不特开馆兴贩之徒闻风远窜，并吸食者亦恐性命莫保，相率改图。"⑦显示出道光对严禁主张的重视。在议复期间，道光多次谕令加紧查缉鸦片，奖惩日益严明。7月，降旨将吸烟太监李秋澄枷号两个月，满限后发往黑龙江给兵丁为奴。8月，破格提升查拿鸦片有功的官吏李遇享。9月，将步军统领衙门拿获的吸烟官吏革职。10月，奖擢收缴烟土最多的湖北汉阳知县郭觐宸，并将"赴尼僧庙吸食鸦片烟，实属藐法无耻"的王公奕賚、溥喜革爵，⑧首倡驰禁的许乃济也被勒令降职休致。这一系列行动表明，道光站在了严禁派一边，已准备实行严禁政策。

道光对严禁派的支持不是偶然的。1836年后，驰禁主张虽然不再有人提起，但也没人提出更有成效的禁烟方法，鸦片输入的情况没有得到根本抑制。如何采取一种新的禁烟措施，始终是道光所考虑的一个问题。他感觉到，"鸦片烟流毒内地，传染渐深，总由各该省地方官因循懈忽，以致殆患养奸。"⑨而官吏的因循，不外乎或贪贿包庇，或本身就是吸食者，正如林则徐所指出的那样："衙门中吸食者最多，如幕友、官亲、书办、长随、差役，嗜鸦片者十之八九，皆力能包庇之人，若不从此严起，彼正欲卖烟者为之源源接济，安肯破获以断来路？"⑩严禁派指出了吸食者众是烟毒不清的根源，官吏嗜烟包庇是禁烟难以深入的症结，分析了鸦片带来了国弱民穷、财匮兵羸的恶果，提出了新的根治措施，自然引起了道光的共鸣和重视。在奏复禁烟章程的同时，林则徐等人已在两湖地区开展了禁烟活动，短期内就取得了重大成效，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收缴烟土一万八千余两、烟具四千三百余件。这一成绩不仅攻破了反对派对严禁措施的种种非难，而且从实际上向道光证明："民情非不畏法，习俗大可转移，全赖功令之森严，始免众心之涣散。"⑪使道光认识到："果能振刷精神，实心查办，自可渐有实效。"⑫他不仅坚定了严禁的信心，"决心以严厉手段对付吸食者。"⑬而且属意于严禁派，准备启用严禁派主持禁烟。他在林则徐的一份奏折上朱批："凡事若能如此，有何不可挽回。朕意在言外，卿其善体朕心，决意勉为之。"⑭

1838年11月9日，道光命林则徐入京觐见。林则徐到京后，道光对其礼遇殊隆，特赐紫禁城内骑马，乘肩舆。八日之内连续召见八次，被视为"国初以来未有之旷典。"⑮君臣二人详细地讨论了禁烟问题。道光不仅采纳了严禁派重治吸食的主张，也吸取了某些反对派提出的"严海口之禁以杜其源"的正确见解，将禁烟方针调整为重治吸食与禁绝来源并重、以禁绝来源为首务。12月31日，道光颁给林则徐钦差大臣关防，节制粤省水师，赴广东查禁鸦片，从而掀开了近代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最新一页。在临行前，道光对林则徐表示"不为遥制"，⑯给以充分的信任。在各省议复奏到后，道光谕令军机大臣等讨论制定新的禁烟章程。在制定过程中，穆彰阿等人企图将鸦片罪名"从轻"，被道光制止。⑰在道光的监督过问下，清政府于1839年6月颁布了《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这一条例把严禁派的主张法律化，是百余年来清政府的一个最为彻底的禁烟法令，推动了禁烟运动的大规模开展。

1839年3月，林则徐来到广州。他按照道光"务永杜来源"的指示，⑱采取了销烟与断源双管齐下的战略。对林则徐采取的各项禁烟措施，道光都给予充分的支持。在发给两广总督邓廷桢的上谕中道光说："卿等同钦差大臣林则徐能合力同心，除中国大患之源，不但卿能懋赏，即垂清史册，朕之光辉岂浅鲜！而生民之福、政治之善，又非浅鲜。谅卿等亦不烦淳淳告

诚也，勉之勉之！⑲在林则徐谕令外商缴烟的谕贴上，道光朱批：“朕心深为感动，卿之忠君爱国，皎然于域中化外矣。”⑳林赴粤后，穆彰阿、琦善等人制造流言蜚语，对林则徐中伤攻击。道光表示：“林则徐、邓廷桢等皆朕亲信大臣，畀以重任，现在查办鸦片正在吃紧之时，断不可因群言淆惑，稍形懈驰。”㉑不为流言所动。林则徐不负委任，迫使鸦片贩子交出鸦片二万余箱。缴烟结束后，道光称赞“所办可嘉之至”，下令将林、邓交部从优议叙。6 月，林则徐遵照道光的谕令，将收缴的鸦片在虎门滩全数销毁。禁烟运动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英国殖民主义者。这一胜利的取得，固然有林则徐的杰出贡献，但与道光的支持，特别是其任人得当是分不开的。道光不顾多数官员的反对，确立严禁政策，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主持禁烟，为林则徐的活动提供了基本条件，在这一基础上，林则徐以高度的爱国热忱把禁烟运动推向了高潮。因此，不应把道光的决策与林则除的禁烟活动割裂甚至对立起来。这一点，马克思曾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说“中国政府在 1837 年、1838 年和 1839 年采取了非常措施。这些措施的顶点是钦差大臣林则徐到达广州和按照他的命令没收、焚毁走私的鸦片。”㉒

二

1840 年 6 月，英国正式发动了侵华战争。7 月 24 日，定海失陷的奏报传到北京。道光立即谕令将有守地之责的浙江巡抚乌尔恭额及提督祝彪革职，“著邓廷桢选派闽省大员，带领舟师，星飞赴浙。无论夷船在于何处，会同浙江水师，合兵会剿，以期一鼓成擒。”同时又令伊里布“遴派带兵大员，拣选水师数千，预备调遣。”㉓8 月 2 日，又指示杭州将军余明保“星夜赴乍浦海口迎接，相机堵剿”。并训示方略说：“英夷沿海滋扰，所恃船身坚大，枪炮便利。我军水战骤难战胜，不若诱之登陆，可期聚而歼旃。”㉔8 月 23 日，在接到英船北上天津的奏报后，道光谕令琦善：英船“倘驶进天津，求通贸易，如情词恭顺，该督当告以天朝制度，向在广东互市，天津从未办过成案。……断不能据情转奏，以杜其觎觊之私。倘有桀骜情形，即统帅弁兵，相机剿办。”㉕对邓廷桢奏报保卫厦门一事，也有“所办甚好”的朱批，并赏擢有功人员。这些行动表明，在定海失陷后的一段时间里，道光还是准备抵抗侵略的。但是在英军逼进大沽后，道光却谕令琦善：“如该夷船驶至海口，果无桀骜情形，不必遽行开枪开炮。倘有投递字贴情事，无论夷字汉字，即将原禀进呈。”㉖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道光的这一变化，论者多归之于道光的昏聩或干脆称之为妥协投降。这种结论不仅失之笼统，而且与事实不符。实际上，道光的变化是受其一贯的“不失体制而免衅端”的外交方针影响的结果。㉗这一方针是当时清统治日益衰败、危机四伏的产物。国内阶级矛盾激化、统治不稳，国际空虚、财政拮据，军队腐化、武备废驰，这些因素使道光不敢轻言战事、对边衅十分敏感，惟恐外患内祸交并。而传统的夷夏观念又使他不肯放弃或改变体现惟我独尊、天朝上国地位的体制。道光的外交方针有值得肯定的一面。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极力打开中国大门、进行殖民掠夺的情况下，对体制的坚持，一定程度上有保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的作用。而对边衅采取审慎的态度，也未必无可取之处。但是究其实质，这一方针却是落后的封建大国“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的反映，㉘是以与“外界完全隔绝”来“保存旧中国”㉙的一个消极被动的方针。在资本主义东侵势不可免的情况下，道光既无力革新政策以增强抵抗力量，又不愿顺应世界潮流，放弃惟我独尊的体制观，调整具体的对外政策，这就使保体制与免衅端难以两全。在广东禁烟活

动的初期，道光表现得比较谨慎，几次提醒林则徐“不至肇开边衅”。但后期的态度却日趋强硬，甚至有“朕不患卿等孟浪，但戒卿等不可畏思”之谕。㉚这种强硬，并非是道光改变了不准肇开边衅的立场，而是不谙形势所表现出来的虚骄，根本没有虑及禁烟有可能转化为战争。而一旦战争爆发，侵略者长驱直入，道光又退回到原来的外交方针上来，试图消弭衅端，在不失体制的情况下罢战息兵。定海失陷后，朝中的主和派趁机对林则徐大加攻击，更使道光相信，是林、邓办理不善而启衅，对林、邓的支持随之动摇。于是，道光转战为抚，决定采取羁縻政策。在琦善与英军一番交涉后，道光于 9 月 17 日任命琦善为钦差大臣，赴广州与英军继续谈判，同时下令将林则徐、邓廷桢革职查办。

由抵抗转向羁縻，是道光重大的决策失误，使清政府失去了利用战争初期英人势单力孤、兵力分散的特点组织抵抗的有利机会。对林、邓的罢黜，使抗英斗争失去了真正的领导力量，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决定了战争的结局。但从性质上看，羁縻政策还不同于妥协投降。对英国侵略提出的割地、赔款等要求，道光都严加拒绝，对英军也保持了一定的警惕。天津谈判期间，道光多次谕令沿海督抚“督饬防堵及地方文武各员，留心了望，严加守御。倘驶入内洋，竟敢入口登岸，即著开枪开炮，相机痛剿。”㉛英军南下后，道光又谕令：“其应布置严密之处，仍不可稍形松懈，是为至要。”㉜。

广州谈判开始后，随着英军侵略意图的明显化，道光又重新确立了抵抗政策。道光转抚为战，并非如通常所认为的那样，自 1841 年 1 月 27 日谕告中外开始。实际上，从琦善赴粤后不久，道光的态度就有所变化。由于伊里布与英人交涉归还定海毫无结果，道光感到侵略者并不象他想象的那样易于满足，开始有所警惕。1840 年 12 月 19 日，道光在发给伊里布的廷寄中表示：“倘粤省查办不能妥协，或该夷意在寻衅，其势万不能已，彼时应调何处弁兵，著伊里布一面檄调，一面奏闻。”㉝12 月 26 日，道光谕令琦善：”夷情叵测，包藏祸心，已非一日。彼欲肆无厌之求，我当有无虞之备。著琦善详加体察，密行侦探，一面与该夷目善议戢兵，一面整饬队伍，遴选将弁。枪炮务必得力，船只必堪驾驶，妥为布置，毋省疏虞。”㉞次日又指示琦善：“如有不得不攻剿之势，则兵贵神速，不可稍有迁延，坐失良机”。㉟同时令沿海各省备战。这表明，在广州谈判开始时，道光已采取了备战与羁縻的两手政策。

随着广州谈判中英国侵略者提出的条件日益苛刻，道光主战的倾向也越来越明显。12 月 30 日，琦善《英情日渐迫切现在筹办折》奏到，道光当即表示：“匪待地方不能给予尺寸贸易，即烟价亦不可允给分毫”，同时调集湖南、贵州、四川兵丁，进行战争准备。又指标琦善：一面与之论说，多方羁縻，一面妥为预备，乘机攻剿。㊱这时道光心中的羁縻已仅仅是牵制侵略者的一种手段，明显地把重点放在了抵抗上。琦善屈服于侵略者的压力，奏请允许英人于厦门、福州两地通商。1841 年 1 月 6 日道光接到琦善的这份奏折后，不仅决心以武力抵抗侵略，也对琦善对侵略者的妥协让步十分愤慨，朱批“不值寓目”，并加急驰谕琦善即刻中止谈判，“倘该逆夷驶进口岸，即行剿办”，并表示“朕志已定。断无游疑。”㊲这份上谕标志者道光抵抗政策的再度确立。对道光的这一系列谕令，琦善拒不执行，他惟恐备战会激怒侵略者，有碍和议，致使广州“没有任何有组织的防御系统，”㊳英军趁机攻占大角、沙角炮台。此后琦善更是变本加厉。竟擅自同意割让香港。1 月 27 日，大角、沙角失陷的奏报到京，道光发旨严责琦善的投降行径，谕告中外，要对侵略者“痛加剿洗”，又任命奕山为靖逆将军，率兵赶赴广东抗击英军，不久，又将琦善革职拿问。

道光由羁縻转向抵抗，同禁烟时期的强硬一样，也包含着不甘天朝上国的威严受到损害

这一自大虚骄的因素。道光相信，虽然英人船坚炮利，但陆路交锋却无能为。这是他敢于抵抗的一个重要精神支柱。这里已伏下了再度动摇的隐患。但是，在侵略者肆其贪欲、琦善一意妥协的情况下，道光改变羁縻方针，再度确立抵抗政策，使中断了的抗英斗争得以继续，仍然具有积极意义。

道光转抚为战、命将出师后，态度日趋坚决。1841年2月，他颁旨以抵抗派大员裕谦为钦差大臣赴浙江攻剿。3月，以观望迟疑、庸儒无能的罪名将主和派的重要人物伊里布革职，同时又谕令奕山兼程前进，“到粤后会集各路官兵，一意进剿，歼除丑类，设法擒渠，必使该逆片帆不返。”㊴并向广州增派了兵力。但是，广州战役不仅没能象道光期待的那样”全将该夷驱逐，各地尽行收回”，㊵反而签订了屈辱投降的《广州和约》。这次战役的失败，不能完全归咎于道光，由于琦善的妥协投降，虎门已被英军占领，广州门户洞开。在这种情况下，奕山等人不顾敌强我弱、清军已处守势的现实，盲目浪战，希图侥幸取胜，同时又奉行“防民甚于防寇”的反动方针，结果一败涂地，应负主要责任。不仅如此，奕山等人为了掩盖兵败投降、纳贿求和的丑行，竟然饰败为胜，编造一个英人乞抚恳恩的弥天大谎上奏。导致了道光对战局判断的严重错误。在接到奕山的奏报后，道光认为“既经惩创，以示兵威”，战事已经结束，遂批准恢复广州的中英贸易。紧接着又下令各省撤回所调防兵。这是道光第二次重大的决策失误，致使抗英斗争再度中辍。这次失误，除了奕山等人的欺朦外，道光本人的自大虚骄也是重要的原因。广州战役后，闽浙总督颜伯焘上折揭露奕山谎报胜利，但道光对此并不重视，仅以“所闻与所奏迥异”要广西巡抚梁章矩察明回奏。梁的回奏虽然含糊其词，但也指出访察情形与廷寄所开“并无歧义”，㊶透露出英人的“乞抚”有可疑之处。然而道光仅批一“览”字了事。原因即是他认为已示兵威，而且“夷情安贴，”应先威后德了。对于撤退防兵，也有人提出不同意见，但道光固执己见，自以为是，根本听不进去。盲目虚骄使道光根本不了解中英的实际形势，腐朽官员的欺骗又使道光了解不到战局发展的真相，这样必然会导致决策的错误。

三

1841年8月，英军再度北上，发动了更大规模的侵略。道光匆忙停止撤兵，严饬沿海各省严防。但事机已失，措手不及，沿海各省的战事组织和指挥均不得要领，更有一班怯懦将领官吏望风而逃，至10月初，定海、镇海、宁波等地相继失守。为挽回局势，道光再次命将出师，任命奕经为扬威将军，驰赴浙东发动反攻。结果同广州战役一样，也是一败涂地，溃不成军。浙东战役的失败，是道光由抵抗走向妥协的一个转折点。这次战役是道光在鸦片战争中组织的最大的一次抵抗，动用的军队除当地的防兵外，由外省调入的就有一万一千多人，募集乡勇二万余人，支用饷银一百六十余万两，不可谓没下决心。为了战役的胜利，道光一再告诫奕经“布置周到，万勿性急”，计出万全，谋定后动。㊷并表示不为遥制，以免掣肘。然而，这些动力并未带来他引领东南、日夜企望的捷音，抵抗的信心也因之动摇。如果说在广州战役后，道光还认为虽然在海上不能与侵略者争锋，但在陆上尚可一决战阵的话，那么浙东战役后，在道光看来，无论海上陆路，都已难与侵略者争持。浙东战役后，奕经奏请调劲兵进剿。道光批示说：“事已如此。添调何难。前一布置，似乎确有把握。一经动作，受亏退步。又欲俟数千里之外之续调之兵到齐，再图进剿。无论旷日持久，必能保其成功乎？”㊸

军事抵抗的失败，直接影响到清政府中主战与主和两派力量的消长。浙东溃败后，主和

派空前活跃，利用军事失利为妥协张本。穆彰阿每闻战败消息“辄相顾曰：如何！盖谓不出所料也。”㊹耆英等人大谈“仁圣与民休息，耀德而不观兵，并无伤国体。”㊺与此相反，主战势力却急剧消沉。廷议中几乎再见不到主战的言论。“时事中变，识时务者不复言兵。”㊻原来主战的大吏，或兵败身死，如裕谦；或丧师失地，如颜伯焘。这种事实在影响道光趋于妥协上，并不亚于主和派的鼓噪。还有一些原来激烈主战的官员，如刘韵珂，浙东之战后却一转而为主和派，这些人的妥协主张，道光更易于相信。刘韵珂在奕经败后曾上折，提出如继续抵抗，则有“十项可虑”，旁敲侧击地劝说道光独操乾断，随机应变，妥协办理。㊼这份奏折对道光很有影响。在这样一片主和声浪的包围中，对抵抗已失去信心的道光必然要转向妥协。

军事失利对清统治固有矛盾的激化，也是影响道光转战为和的重要因素。首先是阶级矛盾的激化。清政府吏治与军队的腐败在战争的情况下更为突出，对人民的敲榨与骚扰也倍于平时。多数清军在侵略者面前不堪一击，而对平民百姓却暴虐异常。军费浩大，最终还是由人民负担。许多官吏又趁机暴敛横征以饱私囊。当时即有人揭露说：“比年以来，地方官不能上体圣意，于近海之区，籍防堵以派费，于征兵之境，借征调以索财。以及道路所经。辄以护送兵差，供给夫马为名、科敛无度。”㊽这就不可避免地使阶级矛盾在某些地区激化。1842 年湖北崇阳发生了钟人杰领导的起义，清政府历时一个月才镇压下去。其它省份也程度不同地出现过反清起义和暴动。这使得统治者格外担心，如果不赶快结束战争，“安保此外不另有不逞之徒乘机而起。”㊾

其次，封建军制不适应对外战争的矛盾突出。清军总兵力约八十万人。至浙东战役前，除发生战事几省的额定兵丁外，清政府从外地调入的军队约三万五千人，这个数字在总兵力中所占比例并不大，但清军的建制与设备是以防内为重点的，驻防分散，又兼有地方治安之责，可供调动的机动部队无多。因此，这个数字已接近清政府能调动的兵力的极限，致使一些督抚表示“实无一兵可调”。由于装备落后，清军机动性很差，从邻省调入即需时一个月，较远省份则要二、三个月之久。这就使清军完全丧失了战场上的主动权。英军依靠海上优势，集结迅速，转运及时，打完即走，而清军则一处闻警，处处严防，兵力分散，奔疲于命。尽管调兵不少，但在一城一地的交锋中，兵力并不占优势，有时甚至是劣势。浙东战后，这种情况更为严重，闽、浙、粤、苏及邻近几省兵力空虚，无法征调。在“无兵、无人、无船、奈何、奈何”㊿的哀叹声中，道光不得不赶紧谋求妥协，息兵罢战。

再次，财政危机日趋严重。巨大的军费开支给清政府造成了沉重的压力，使本来就千疮万孔的财政更为拮据。户部 1841 年 12 月奏称：“一年有余，请拨银已至二千一百万两之多。”由于财政匮乏，清政府在浙东之战后只能靠抽裁内地额兵的办法来向前线增兵，而无法多行征召。这种挖肉补疮的方法当然解决不了问题。浙江巡抚刘韵珂在奏折中说：“就令该夷不复他扰。而浙省一日不能罢兵。他省一日不能驰备。计七省一日之防费，为数甚巨，防无已时，即费难数计。靡饷劳师，伊于胡底？”51这的确道出了道光所焦虑的一个问题，也是道光再度动摇的一个原因。

主和派的鼓噪、客观形势的逆境发展与“无兵可调”、财政拮据的压力，使对继续抵抗已失去信心的道光开始谋求与侵略者妥协。1842 年 4 月，道光起用主和派耆英、伊里布赴浙江，充当与侵略者妥协的使者。不过，这时的道光虽然有了妥协倾向，但还没有下定彻底妥协的决心。中国毕竟是第一次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生战争，道光还不了解资本主义侵略的方式、特点，对彻底妥协还有顾虑。同时，以君临四海的天朝向夷人求和，也使道光极不甘心，还存

有一线幸胜的企望，幻想败后求胜。任命耆英后，道光一面指示耆英探寻英人的议和条件，一面告诫耆英："如复书内有分外要求、万难应许事件、即与牛鉴一意防守，可剿则剿，当堵则堵，慎勿稍存游疑之见。"㊾又谕令奕经要"激发天良"、"如有可乘之隙，务当明攻暗袭"。㊿不可因有耆英的委任而相顾瞻循，"朕唯责卿以剿贼复地，……至耆英原因另有委用之处，果否施行，候朕随时裁夺，无非备其一端而已，如能勿用，朕所深愿。"㊿道光这种战无信心和不甘心的矛盾心理使得这一段的战争指挥步武纷乱、方寸皆无。5 月 20 日，御史苏廷魁奏称广东传闻英被孟加拉攻破，道光的侥幸心又被激起，突然改任耆英为广州将军，赴粤"明攻暗取，收复香港，以伸国威"，又命奕经"趁此夷情窘迫之际，乘机进剿，大张挞伐"并严责耆英等人"一见夷船即惊慌失措，先事羁縻，办理殊未得宜。……今耆英赴广东将军任矣，所带伊里布、咸龄，即交奕经留营差遣，如无可委用之处，即一面奏闻，一面饬令回京。"㊿似乎又倾向于战了。然而在英军逼进杭州后，却又收回成命，令耆英暂缓赴粤，"专办羁縻。"7 月 9 日，耆英奏报接到英人收文，不肯戢兵，道光发旨："该逆即不肯戢兵，若再事羁縻，且恐有伤国体。著与牛鉴、程矞采专意剿办，无稍游疑。"㊿但不过五日，又表示可以接受英人割地通商等条件。观察一下吴淞失陷前道光和战的几次反复，可以看出两个特点：一、倏尔倾向于战或是希图侥幸，或是担心侵略者要求过高，而不是重新有了抵抗的信心。二、每次反复，都向彻底妥协走近了一步。这表明，随着英军侵略的进一步加深，道光最终要彻底投降。

1842 年 6 月，英军攻占吴淞、上海，进逼长江，虽然道光一再严饬堵剿，但负责迎敌的督抚提镇大员多株守尸居，战事愈加不堪。耆英等人的乞和投降更加迫不及待，上折要道光"俯念东南时势"，"曲与矜全"，速下投降决心。7 月，镇江失守。8 月，英军兵临南京城下。在绝望之中，道光不得不允许耆英"便宜行事，"接受侵略者提出的全部要求。8 月 29 日，耆英等人代表清政府与英军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

四

鸦片战争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作为这场战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道光有应得之咎。其一在方针有误。封建末世危机四伏、内忧外患交逼的现状迫使道光采取了不启边衅、不失体制的对策方针，这一方针内在的矛盾及其落后性，已使其失去了成功的可能，在这一方针指导下的清政府对英政策也就出现了游疑不定、忽争忽和的特点。在边衅与体制上，道光更重视后者，无论是禁烟还是抗英，目的都在于维护封建统治。因此，当军事抵抗失败使国内政治、经济、军事的矛盾激化，形成对封建统治的威胁后，道光终于彻底妥协。其二在用人有误。禁烟运动所以能取得重大的胜利，在于任用了林则徐，而自林则徐被革职、代之以琦善后，形势变急转直下。虽然琦善最后被革职拿问，但广州的抗英斗争已受到难所弥补的严重损失。在此后的军事抵抗中，道光所重用的奕山、奕经等人都是纨绔贵族，毫不知兵而又极端腐化，根本不能胜任统帅之职。在浙东战役后，道光越来越信用主和派，在主和派的鼓惑下，道光只好同意"俯顺夷情，俾兵萌早戢。"㊿其三在决策有误。鸦片战争中的两次大的战抚反复，即天津谈判后的羁縻与广州之战后的撤兵罢战，都建立在错误的判断基础上。英军北上天津被道光视为恳清"申冤昭雪"，广州之战则被当作"乞抚通商"。在道光罢兵之时，英军却在酝酿更大的侵略行动。决策错误的原因，在道光来说有其必然性。没落的封建阶级固有的腐朽性，如自大无知、虚骄固执、自以为是等等。，在道光的身上都有充分的表现、必然要影响到决策，同时又与

封建体制下决策机制的落后性有一定的联系。封建专制体制决定了决策权操诸皇帝一人手中。无论是负责谈判的官员还是前敌指挥的将领，都没有随机处置之权。每事必要奏请，奉旨允行。在决策中心与前线甚远、奏报需时的情况下，道光得到的是过了时的情报，前线得到的是落后于形势的谕旨，不免要造成决策的不及时、错误和混乱。

但是，把道光在鸦片战争中的所为看作是实施一条妥协投降路线，并非历史真实。鸦片战争是英国蓄意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又是中国近代第一次武装反抗西方资本主义侵略的民族自卫战争。从这个角度来观察道光在战争中的举措，就不能否认有抵抗侵略、维护国家民族利益的一面。禁烟运动的胜利不能说与道光无关，人们常常注意到林则徐的功绩，却忽视了这也是清政府严禁政策的结果。就军事斗争而言，在鸦片战争的绝大部分时间里，道光坚持了反抗侵略的立场，直到浙东战役后，才开始倾向妥协，而放弃抵抗，则是在吴淞失陷之后，此前虽有战与抚的反复，有失误，但抵抗是基本倾向。就最后妥协一点来说，道光同意议和与后来清统治者“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态度还是有所区别的。对于失败，道光并不甘心，还在议和未定局时，道光即谕令沿海各省加强武备，制造大号战船。㊾《南京条约》签订后，又多次申令整顿防务、破除积习。“善后急需整顿，炮火尤为利器，……自应宽为预备。妥为收贮，惟须精利适用，不可有名无实。”㊿这些言论表明，道光还有振作一番的想法。但是，封建大厦已千疮百孔，摇摇欲坠，绝非粉饰修葺所能济事。道光本人又缺少力挽颓局的魄力与才干。在世界资本主义炮舰东来的大变局面前，他懵懂无知而又深闭固纳，终不免成为一个悲剧人物。

---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54 页。

②福州史学会编：《鸦片战争及林则徐研究外文资料选择》，第 29 页。

③《鸦片战争》第六册，第 141 页。

④⑤㉒《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28 页。

⑥《鸦片战争及林则徐研究外文资料选择》，第 22 页。

⑦《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 598 页。

⑧《东华续录》道光三十八。

⑨《宣宗实录》第 314 卷，第 31 页。

⑩《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 600 页。

⑪《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 597—598 页。

⑫《宣宗实录》第 313 卷，第 15—16 页。

⑬郭士立：《道光传》，伦敦 1852 年英文版，第 157 页。

⑭《宣宗实录》，第 314 卷，第 36 页。

⑮《鸦片战争》第一册，第 64 页。

⑯《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 64 页。

⑰《林则徐集·日记》，第 339 页。

⑱《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 155 页。

⑲《宣宗实录》第 318 卷，第 26 页。

⑳《宣宗实录》第 320 卷，第 30 页。

㉑《宣宗实录》第 326 卷，第 36—37 页。

㉓《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 328 页。

㉔《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 334 页。

㉕《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 337—338 页.
㉖《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 359 页.
㉗参见拙作《略论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天津谈判》，《史学集刊》，1987 年第一期.
㉘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260 页.
㉚《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 226 页.
㉛《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 448 页.
㉜《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 467 页.
㉝《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第 598 页.
㉞㉟《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第 608 页，609 页.
㊱《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第 618，619 页.
㊲《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第 632 页.
㊳柏纳德：《复仇神号航行作战记》第 1 卷，伦敦 1844 年英文版第 346 页.
㊴《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第 834 页.
㊵《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第 1006 页.
㊶《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第 1139 页.
㊷《鸦片战争》第 4 册，第 272 页.
㊸《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四，第 1693 页.
㊹《鸦片战争》第 5 册，第 531 页.
㊺《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四，第 2040 页.
㊻《徐继畬致林树海书》.
㊼《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四，第 1678 页.
㊽《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四，第 1704 页.
㊾㊿《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四，第 1682 页.
㊿《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四，第 2133 页.
(52)《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四，第 1991 页.
(53)《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四，第 1814 页.
(54)《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四，第 1799 页.
(55)《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四，第 1807、1802、1810 页.
(56)《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四，第 2027 页.
(57)《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四，第 2127 页.
(58)《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五，第 2264 页.
(59)《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五，第 2342 页.